

第一章 绪 论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到 1919 年五四运动的前夕，是中国古代文学向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转型时期。文学界将它称之为中国近代文学。从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初期的这个 80 年间，既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一个时期，也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剧烈变化的一个时期。发生、发展于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近代文学，无论是作家身份、文学观念，还是在文学载体、接受对象诸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它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光辉终结，又是通向中国现代文学的纽带与桥梁。

第一节 历史转折与文学转向

鸦片战争的爆发，带来了近代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而这种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又促使传统文学开始转向，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历史的转折

19 世纪中叶，中国仍然是清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封建国家，处于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极端保守、落后的状态。在经济上，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农民既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也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而从明代中叶就开始出现于商品经济

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沿江地区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其发展则极为缓慢。在政治上，清王朝仍然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皇帝总揽一切大权，独断专行；整个统治集团内部贪污腐化、敲诈勒索、营私舞弊成风。对外推行的是一种闭关自守的政策，对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几乎一无所知；对内则残酷盘剥农民，大肆搜刮民财和兼并土地，使广大农民陷入贫困、破产和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激化，导致了全国各地农民起义的不断发生。从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中叶，几乎每年都爆发农民起义。1813 年 10 月，白莲教支派天理教首领林清率领的一支起义队伍，在皇宫太监的协助下，曾一举攻入紫禁城。此时，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呈现出一种日薄西山、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状态。

当清王朝国势日益衰微，却仍然做着“天朝大国”美梦的时候，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并逐渐转变为帝国主义阶段的时期。英国在 17 世纪中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又于 18 世纪末开始了产业革命，至 19 世纪初期完成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并远远超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早期殖民国家，一跃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和美国虽然赶不上英国，但其发展速度也非常之快。

正是由于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先后完成工业革命之后，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因而，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产品大量过剩。为了寻找商品的倾销市场并掠夺原料产地和人力资源，它们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侵略狂潮，将掠夺、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世界各地，使非洲、大洋洲、亚洲广大地区的弱小国家，先后沦为或正在沦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且封闭、落后，自然就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凯觎的对象。

1840 年，英国在经过长期准备和试探之后，发动了旨在保

护罪恶的鸦片贸易的对华战争，即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中国惨败并被迫与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通过《南京条约》，英国在中国获得了许多非法利益。它极大地刺激了其他殖民主义国家掠夺、奴役中国的野心。于是，“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¹。

从此，西方殖民主义强国争先恐后、连续不断地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每一次战争，中国都以失败告终，并被迫与之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完全暴露了清王朝外强中干、腐朽无能的本来面目。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的这一系列侵略战争，促使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原来完整、独立、自主的封建帝国被破坏，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

二、文学的转向

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体裁，如诗赋词曲等，发展到清代中叶，除小说外，其他如诗、文、词、戏曲等，虽然作家作品众多，风格流派多种多样，但大多因袭旧的艺术形式，缺乏新的思想内容，因此，已日趋衰落，走向末路。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近代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进程，近代文学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等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上），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变化。具体说来，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文学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了全新的认识。鸦片战争以前，对文学的社会功能一直停留在言志、讽谏、载道等认识上；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认为文学具有左右世界之力，可以扭转乾坤，是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重铸国民灵魂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小说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长期以来，封建士大夫将小说、戏曲都视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而将诗文看作是文学的正宗。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资产阶级维新派看到了小说在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中的作用，发动了文学改良运动，倡导“小说界革命”，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认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的作用（同前），主张小说自觉地为现实政治服务。蒋观云亦倡导“戏曲改良”，强调“使剧界而果有陶成英雄之力，则必在悲剧”（《中国之演剧界》），肯定悲剧文学作品的价值。他们将小说、戏剧看作文学殿堂中两座尊贵的神，从而使中国传统的文学体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诗、文、小说、戏剧四大文体平起平坐、共同发展。

其次，一直被正统文人奉为传统文学正宗地位的诗文，此时在题材内容上有了较大的拓展。它们不仅大胆揭露社会的腐朽黑暗，猛烈抨击封建落后的思想，紧密联系社会实际，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个人的真情实感；而且高唱反帝爱国战歌，热情颂扬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与帝国主义列强斗争的事迹和顽强精神；还融进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歌颂和倡导民主、自由、进化、自强的精神，与传统诗文在题材内容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三，在近代翻译文学热潮的推动下，外国许多新的文学类型也被引进我国，尤其是在小说方面。那些进步的翻译家们，有意识地陆续介绍引进了政治小说、虚无党小说、社会理想小说、

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教育小说等新的小说类型，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文学品种，而且促进了这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生长、发展。中国的话剧，也是受到日本及欧洲戏剧的影响而产生的。

其四，随着翻译文学作品的广泛流传，西方国家的一些新的文学表现技法也不同程度地为中国作家所吸取和借鉴。如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被打破，出现了日记体、书信体、游记体等形式；传统小说第三人称全能视角讲故事的叙事模式也受到冲击，第一人称的叙事模式在近代后期的小说中得到普遍应用；倒叙、补叙、插叙，人物的心理刻画、肖像刻画以及自然景色和人物生活环境的描写等许多描写手段的运用，都使这个时期小说的艺术手法、组织结构，呈现出了新的特色。

此外，近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吸取了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使文学语言开始由典雅的文言逐渐向通俗流畅和浅显直截的方向发展；而且还吸收了西方语言中的句法、词语，使中国的文学语言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五四”以后白话诗的流行，正是近代诗歌通俗化发展的自然结果。

尽管以上几个方面并不是近代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变化的全面反映，但仅由此我们也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使中国古代文学顺利地完成了向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变。

第二节 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轨迹

随着近代社会的剧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国近代文学，也随之逐步发生变化，留下了一条鲜明而又艰难曲折的发展轨迹。

一、中国近代文学的分期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或历史阶段的文学，由于

种种原因和局限，其发展都是不平衡的，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正因为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的发展存在着这种不平衡，故学人们才将它们又划分为若干个发展阶段。根据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大致上可以将它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鸦片战争前后，即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至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第二个时期是洋务运动前后，即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第三个时期是戊戌变法前后，即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至 1905 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第四个时期是辛亥革命前后，即 1905 年同盟会成立至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

我们这样划分，主要是根据近代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以先后自然形成的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改良思潮和民主革命思潮为中心而出现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近代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为标志的。当然，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都有其历史连续性，因此，我们不可能将各个时期完全分开。尽管中国近代文学只有 80 年的历程，其中的不少作家常常跨越两个时期，有些作家甚至跨越了三个时期；但这些作家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作品，仅仅只会在其中的某一个时期起主要作用，或产生较大的影响，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轨迹

第一个时期，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学开始发生变化的时期。鸦片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航程，拉开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从此，那种认为外国都是“蛮夷之邦”，只有中国才是“天朝大国”的盲目自大的传统士大夫心态开始转变；以《四洲志》、《海国图志》的编译为标志，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主张改革腐朽内政，学习西方

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抵抗外国的侵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著名主张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学风上也开始转变，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厌弃宋元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和盛极一时的乾嘉朴学，转而重视“经济”之学，强调“经世致用”、“通经致用”；在文学上，则主张尊情求真，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为现实政治服务，反对以模拟为特征的形式主义。

首开风气的是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经世派。他们敏锐地洞察到清王朝存在的严重危机，揭露批判清政府的腐朽黑暗，呼吁改革朝政，坚决主张抵抗外国侵略，写出了许多富有时代色彩和历史意义的诗文作品，开启了文学变革的先河。同时出现的爱国诗潮，以张维屏、朱琦、陆嵩为代表，并与张际亮、林昌彝、黄燮清、姚燮等人相呼应，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强烈呼声。这些新的文学现象共同构成了这个时期进步文学的潮流。

此时，与进步文学潮流同时存在的尚有其他一些支流。诗歌领域则有“宋诗运动”。它继承乾隆、嘉庆年间的“宋诗派”，以程恩泽、祁寔藻、曾国藩、郑珍、莫友芝为代表，提倡学习宋诗，尤其是学习黄庭坚，主张写诗要有来历，强调用典，形式主义比较严重。散文领域，桐城派的势力仍然较大，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等作家皆是姚鼐的高足弟子，他们一方面坚守桐城义法，另一方面也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进行了一些变革。小说领域，侠义公案小说和狭邪小说开始流行，以《施公案》、《万花楼》、《品花宝鉴》、《花月痕》等为代表，封建意识较浓厚；还出现了以《荡寇志》为代表的与《水浒传》针锋相对的思想倾向反动的小说；小说创作思想倾向日趋堕落。总之，这一时期封建主义文学势力还比较强大；文学创作在逐渐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还不够明显，尚保留着比较浓厚的古代文学色彩。

第二个时期，即太平天国及洋务运动时期，是中国文学发生明显变化的时期。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如洪秀全、洪仁玕等人，提倡一种“文以纪实”、“言贵从心”、朴实明晓的文风，主张冲破封建传统文学的束缚，以通俗易懂的纪实文学来为现实斗争服务。他们对文学的革新，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树立了新风。洋务派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为指导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发展民族工商业，形成了一场影响颇大的自强运动。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的提出，不仅为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一个思想上的缺口，而且让一批进步思想家看到了这一主张所存在的不足，从而极力呼吁废科举，兴学校，设议院，效西法，发展民族工商业，以达到“变法自强”的目的。这种新风尚的出现，既促进了本时期文学的变革，又为下一个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文学革新运动作了铺垫。

洋务派作家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抨击封建主义，倡导变法思想，介绍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表现出关心时事、希望祖国富强的思想。尤其是冯桂芬、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逐渐转变为早期改良主义者；他们反对或抛弃桐城古文，创作了大量议论时事、表达改革思想的诗文，对后来的诗文创作影响很大。王韬、郑观应更将一般古文用之于报章，使古文社会化和通俗化，开启了维新派报章文体的先河。贝青乔和金和是洋务派阵营之外的作家，以其独具特色的诗歌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抨击清政府官吏的腐败无能，表达其反帝爱国、忧时伤世的思想。这些文学现象构成了此时期进步文学的潮流。

与进步文学潮流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一些支流。“宋诗运动”仍然在继续。复古的汉魏六朝诗派活跃起来，他们以王闿运、邓辅纶为代表。散文领域则出现了桐城派的中兴。曾国藩援手桐城，加以改造，使桐城派由衰败走向复兴。这实际上是借桐城派之名，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散文流派，更加直接地为清王朝的封建

统治服务。但此派的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等人因有出国的经历，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变成成为早期改良派，写了不少反映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作品，带给文坛一些新的气息。词坛上最有成就的词家是蒋春霖，其词的艺术性较高，但内容多抵毁太平天国革命，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没落情绪。小说方面，侠义公案小说和狭邪小说盛行，代表作主要有《三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海上花列传》等。虽然有的小说在形式上有一些新的气象，但所反映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

虽然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古代文学色彩仍很浓，但较前一个时期的变化更为明显，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景象，为下一个时期文学的巨大变化准备了条件。

第三个时期，是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救亡图存和维新改良思潮空前高涨的时期。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堂堂的中华帝国竟被一个“弹丸之国”的日本所打败，这实在是中国的奇耻大辱。此时，亡国灭种的现实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救亡图存遂成为时代的一致呼声。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挽救危亡，他们领导和发动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号召人们积极投身维新变法活动，以富国强兵。为配合这场运动的深入开展，他们又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学革新运动，并提出了“言文合一”的强烈要求，号召人们广泛运用白话文从事写作，向着通俗化、自由化的道路迈进。尽管这场文学革新运动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但它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是这场文学革新运动的鼓吹者、领导者和理论家。在这场文学革新运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诗文作家，人们通常称他们为资产阶级维新派作家。其中，诗歌以黄遵宪的成就最高，散文以梁启超的成就最高。另外，康有为、谭嗣同、夏曾佑、丘逢甲、蒋智由、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的诗文创作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是维新派的代表作家。他们的诗文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共同特点，就是“标榜爱国主义，鼓吹新学思潮”（《马君武诗文集自序》）。

由于文学革新运动的促进，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对过去为正统文人所鄙视的小说有了新的认识，使小说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至20世纪初，谴责小说的创作迅速发展，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在众多的谴责小说中，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最为著名，被称之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适应维新改良运动的需要，翻译文学也迅速繁荣起来。不仅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被大量译介进来，一时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学说、进化论、天赋人权思想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大量涌进国内，逐渐为国人所接受；而且还翻译了大量西方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使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学观念、小说理论和写作技巧逐渐为国人熟悉和借鉴，促进了中国小说创作的繁荣。在众多的翻译家中，要数林纾和严复的影响最大、成就最高。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和严复的《天演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戏曲方面，则出现了京剧改良。传统的传奇、杂剧发展到此时已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众多的地方戏剧，其中以京剧的影响最大。为了配合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有识之士对京剧进行了改良，争相编演时事新剧。京剧改良的杰出代表是汪笑侬，他曾改编、创作、演出过《打渔杀家》、《哭祖庙》、《党人碑》等50多个京剧剧目，表达其维新改良的爱国思想。

可以说，以上这些方面，都是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进步潮流，也是此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与此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非主流和其他的文学现象。

在诗歌领域中出现了同光体诗派。这是同治、光绪年间出现的一个“不专宗盛唐”的诗歌流派，作品摹仿宋代的江西诗派，多缺乏现实生活内容，是道（光）、咸（丰）时期宋诗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以陈三立、陈衍、郑孝胥、沈曾植等人为代表。与“同光体”同时出现于诗坛的中晚唐诗派，以樊增祥和易顺鼎为代表。他们主张向中晚唐诗人学习，尤其是学习李商隐，强调诗歌对仗的工巧，在表达技巧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诗歌的内容较贫乏。

词坛上则出现了“清末四大词家”：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他们的词作艺术技巧都很高，而且对前人词作的搜集整理和在词学理论的探讨上作出了很大贡献，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他们词作的思想价值都不高，表达的多为封建文人没落、感伤、消极的思想情绪。此外，谭献、文廷式、陈廷焯等也是这个时期的著名词家或词学理论家。

在小说方面，侠义公案小说、狭邪小说仍在流行，《三侠五义》、《彭公案》等小说的续集不断出现。

散文领域中，活跃于文坛的主要是桐城派、湘乡派的一些作家，如“曾门四弟子”（薛福成、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贺涛、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他们中除少数作家能适应社会变化，写过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好文章外，大多数作家仍然抱住桐城义法不变。

第四个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蓬勃高涨的时期，也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由取得胜利又很快转为失败的一个时期。认真考察一下便知道，早期革命派的许多成员在1905年以前，大多也是维新派，或同情维新派的人士，直到同盟会成立以后，两派才完全区别开来。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1905—1907年间，民主革命派与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民主革命派以

《民报》为阵地，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论战的焦点，是要不要以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最后，论战以民主革命派的胜利而告终。这次大论战，极大地宣传和动员了民众，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推翻清朝统治作了舆论准备。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为了更加广泛地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以推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继承了维新派文学改良运动的主张，促进了民主革命文学的繁荣：他们创办了大量的报刊，以登载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民主革命意识的文学团体——南社。随着民主革命运动的进程，涌现出一大批诗文作家，人们通常称他们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作家。其中，诗歌成就最高的是女革命家秋瑾，散文影响最大的是革命文豪章太炎。南社成员中成就最高的是柳亚子。此外，马君武、苏曼殊、陈去病、高旭、黄节、黄侃、周实、宁调元等人都是南社中很有成就的文学家。

在散文方面，颇值一提的是：青年革命家陈天华，以广大民众喜闻乐闻的说唱形式写成的《猛回头》、《警世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称为“革命军的马前卒”的邹容，撰写了长篇政论《革命军》，轰动一时，广为流传。章士钊创作的逻辑文，以文法谨严、条理清晰、论理充足、文字雅洁见长，使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刘师培早年所写的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骈体文，亦自成一家，雄丽可颂。黄小配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五日风声》，对广州起义的全过程作了艺术的再现，讴歌了民主革命党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在小说创作方面，陈天华的《狮子吼》是一部带有浓重革命理想色彩的政治小说，虽未写完，艺术上较粗糙，人物性格也较模糊，但在表达救亡意识和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方面，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黄小配是民主革命派的著名小说家，他的《洪秀全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重要作

用。苏曼殊撰写了不少带有浓郁浪漫色彩的、且具有自传性质的爱情小说，大多描写开始觉醒的知识分子对自由爱情的追求以及他们的爱情与封建礼教的冲突（代表作为《断鸿零雁记》），在当时别具一格，颇为流行。

。在戏剧方面则诞生了新式话剧。1907年，一批留日学生组织了中国第一个业余剧团——“春柳社”，主要成员有曾孝谷、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他们将林纾翻译的小说《黑奴吁天录》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大获成功。随后又创作或改编了不少新剧（早期话剧的别称），回到国内演出，积极配合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好评。

以上这些都是这个时期进步的文学潮流，也是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主流。

1912年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革命由胜利转为失败，民主革命文学走向衰落，而封建文学又复辟泛滥。此时的作家队伍开始出现大分化：有的消极颓废，有的悲观厌世，有的与封建遗老遗少同流合污，也有的继续与袁世凯进行斗争，整个文坛黑暗一片乱糟糟，成为中国文坛最没有生气的年代（1912—1917）。

诗坛上，同光体和其他复古派诗人仍在活跃；文坛上，则活跃着桐城派的末流；剧坛上，上演的多是宣传因果报应、封建迷信、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的剧目。

小说创作方面，流行于市场的主要是鸳鸯蝴蝶派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实际上是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在新形势下的变种。它是一个通俗小说流派，追求文学作品的娱乐性、消遣性和趣味性，以迎合小市民的审美情趣，表现出明显的消闲性质和金钱主义倾向，曾受到新文学家如鲁迅、钱玄同、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等人的严厉批评。不过，这类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以及写作技巧等方面都有新的开拓。代表作家作品有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

秋的《广陵潮》、李定夷的《美人福》、吴双热的《兰娘哀史》、陈蝶仙的《泪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张恨水的《啼笑姻缘》等等。其中的黑幕小说，是一种专门揭人隐私的小说，则谈不上什么审美价值和文学价值。

封建主义文学的复辟泛滥和鸳鸯蝴蝶派小说流行的现实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他们不可能单独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也不可能彻底摧毁封建主义文学。这一历史重任只有落在一个新兴阶级——无产阶级的肩上。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月刊）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主编。从第2卷1期（6期为1卷）起改名为《新青年》。1916年底，杂志编辑部迁到北京，继续刊行，直到1922年7月出至第9卷6期停刊。《新青年》的创刊，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吴虞等新文学家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文学，大力倡导建设无产阶级的大众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18年5月，鲁迅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成为“五四”新小说的开山作。它以强烈的反封建精神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指明了出路，预示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如前所述。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将先按发展顺序集中评述进步文学潮流的流派、作家作品；而将落后、保守的文学流派、作家作品集中放在最后两章评述。

第三节 中国近代文学的主要特征

从中国近代文学 80 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近代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鲜明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强烈爱国精神，愤怒地揭露和抨击了清王朝的腐朽黑暗和腐败无能，艺术地再现了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过程，形象地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轨迹。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学相比较，近代文学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征。

首先，文学同现实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文学的社会作用与功利性大大增强。

伴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过去那种文学是文人游戏的工具的看法逐渐改变，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得到极大的提高。无论是经世派、洋务派，还是维新改良派、民主革命派，都能自觉地运用文学的武器来反映现实问题，抨击社会弊端，宣传各自的思想、主张，为各自的政治路线服务。其中的很多作家，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往往集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文学家于一身。同样，宋诗派、同光体诗派、桐城派、常州词派、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等守旧派的作家，也无不利用文学这个武器来宣扬封建思想、粉饰太平、模山范水、吟花弄月，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维护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服务。可以这样说，以往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没有像近代文学这样，与政治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这种文学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的现象，在近代成为一种日益明显的历史潮流，体现了近代文学发展的新方向。但它也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过分夸大了文学的功利性，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不少作品是为了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匆匆完成。因此，艺术上比较粗糙，缺乏必要的锤炼，自然也就培养、造就不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第一流的作家。

其二，文学的题材和内容空前扩大，反帝爱国和思想启蒙成为此时期进步文学的基本主题。

鸦片战争后，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开，清朝统治者“天朝大国”的美梦被惊醒。这一重大的历史变化，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且促使中国文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学再也不是文人手中游戏的工具，而是随着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不断发生着变化。文学已从过去那种狭窄的圈子中跳了出来，使其题材和内容空前扩大。凡人民大众贫困痛苦的生活、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侵略者的穷凶极恶、投降派的媚外卖国、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狂飙怒号，从国内到国外，变革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激流巨浪、死水微澜，都成为作家们笔下创作的素材，得到了充分反映。尤其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列强及其走狗进行斗争的顽强精神，在文学作品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甲午战争以后，变法自强、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一致呼声。随着资产阶级改良派、民主革命派的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思想启蒙的步伐大大加快，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思想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观点，得到广泛的传播，深入人心。社会的巨大变化，人们思想的转变，亦带来了这个时期文学的深刻变化。

总之，中国近代文学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现实生活和走向近代化的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充分地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丰富的艺术形象，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民 80 年来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斗争历程。中国近代文学 80 年的发展历程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反帝爱国、思想启蒙的内容和反帝爱国、救亡图存的主题，成为贯穿中国近代文学的一条主线；中国近代进步的文学潮流，亦成为近代文学发展的主流。中国近代文学所表现的反帝反封建、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业绩，更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

说到爱国主义，我们知道，它是中国几千年进步文学的共同

主题。而近代文学中的爱国主题，又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一，中国近代文学的爱国主题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鸦片战争前，即中国古代文学中所表现的爱国主题，常常带有狭隘的民族观念，具有不同程度的阶级局限性。就其性质而言，基本上属于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融合过程中的压迫与反压迫、掠夺与反掠夺的性质。尽管其中仍有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区别，但它基本上还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民族纷争，属于内部矛盾。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主义强国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们以掠夺和奴役贫穷落后、弱小民族，变其成殖民地为目的，发动了侵略战争。此时的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华民族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已经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发愤图强、救亡图存亦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呼声和愿望。因此，中华民族内部各兄弟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世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争取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成为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这是亘古未见的。

第二，中国近代文学的爱国主题逐步由忠君向批判君权、反对封建专制方向发展，具有从改良向革命转变的特点。在中国古代，每当异族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国家（社稷）、民族、君主往往被视作三位一体，君主也就自然地成为民族和国家的代表，自然地成为号召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一面旗帜，保卫皇室江山，就是保家卫国。因此，古代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题，常常与忠君爱民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忠君就是爱国。而近代文学尤其是甲午战争后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题则表现不一样，它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统治阶级及其专制制度，要求维新变法，进行社会改良。资产阶级改良派中的激进分子如谭嗣同，更在《仁学》中指出：“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是辅桀也，是助纣也！”将忠君与助纣为虐相提并论。严复亦在